

爺」的神像於八月初二晚抬來石井，並在零點時舉行儀式，據當地人講，是為了要讓國姓爺在生日時回到家鄉過一個晚上。不過，這個晚上也沒有過足，大約凌晨一點時分，「神婆」就將「國姓爺」請回去了。於是村民們打點行裝，爬上大卡車，連同「國姓爺」一起，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每年去石井進香的情況基本如此，但今年卻發生了一件意外。原來，今年「國姓爺」在遊村時，村裏的一位老人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居然用鐵棍去敲「國姓爺」神像的頭！因此當「國姓爺」回到石井時，便通過「神婆」向眾人哭訴，說其父親因為他被打，而要他留下來過夜，不讓他回去。這可愁壞了眾村民，但他們也因無能為力而束手無策，只有神婆在一旁又唱又跳，忙碌了好一陣子，好說歹說，總算勸服「國姓爺」回到村子裏去。

儀式的最後一部分是回到埭厝村之後，「國姓爺」還要再一次遊村。這次每家每戶要在院子裏擺起供桌，插上香火，恭候「國姓爺」的大駕光臨。「國姓爺」到來之後，照例又是求些平安、發財的事。每家都遊遍之後，村民們就將「國姓爺」抬回村裏的土廟，整個儀式活動才告一段落。

第二天八月初三（2000年8月31日），各家各戶都要早起，準備設宴招待客人。在這一天的客人裏，有母親娘家的兄弟、出嫁的女兒等親戚和工

作單位中的同事、朋友等等。客人往往是走了一批又來一批，主人家也就不停地陪客人吃飯、喝酒、甚至劃拳。一直到深夜客人都散去之後，主人才可收拾滿桌的狼藉，八月初三鄭成功的生日慶賀活動才算結束。

通過這次儀式活動的考察，筆者產生以下幾點思考：一、在埭厝村，鄭姓村民祭拜鄭成功的活動，似乎與宗族祭祖習俗有一定的聯繫，但已經超越了祭祖的範疇，而是屬於閩臺地區普遍的國姓王爺信仰的一部分；二、埭厝村民抬著本村國姓王爺神像前往南安石井國姓王爺總祠廟進香，表明國姓王爺信仰的權威與象徵獲得了超村落、跨地域的認同，並形成了相應的分香系統。而這又與地方社會的權力關係問題密切相關。三、國姓王爺神誕儀式後的宴請親戚朋友活動，為村民提供了加強和擴大社會關係網絡的機會。這就表明，儀式不僅是對現有地方社會權力關係與秩序的展現，而且還可以創造出新的社會聯繫，對村民的日常生活有著潛在的影響。總之，透過這次儀式活動，可以對村民的宗族、王爺信仰，以及與外界的社會聯繫等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有一個大致的瞭解，但各個方面的內在結構以及相互間的內在聯繫，則有待進一步的考察和分析。

書評

廖迪生著《香港天后崇拜》（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

蔡志祥著《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最近，廖迪生的《香港天后崇拜》和蔡志祥的《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兩書先後出版。兩書皆以地方宗教活動作為切入點，研究傳統文化與地方社區的互動關係。廖迪生主張：「當我們觀察天后崇拜這一個活動的時候，看到的不單只是宗教信仰的現象，也包括人們的日常生活，地方族群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家的管治，地方社會經濟

與政治等問題。」（廖迪生，頁22）而蔡志祥的研究展示：「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習俗，在轉變中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如何保存和變更——在現代都市化過程中，鄉民如何從打醮的組織和儀式中，把掩蓋了的族群意識和社群間的矛盾和競爭，不斷地重新詮釋。」（蔡志祥，頁23）他們兩人一是從酬神著墨，一是從祭幽入手，而不約而同的回到地方社

群如何通過儀式行為和象徵符號來解讀及建構其群體的社會關係。廖迪生強調天后崇拜是人們對外在世界的詮釋和建構其社區關係的手段。而各參與天后崇拜活動的社群，例如政府和地方精英，也藉著參與，互相釐訂和重新釐訂自己與對方在社區中的角色和位置。蔡志祥提出透過打醮活動，地方社區不單再次潔淨其區內的土地和社群，更重新釐訂其社區的界線和各成員的身份和關係。兩位學者皆主張宗教活動並不是單單滿足人們心理上的需要，也有其社區功能；既是文化建構的產物，也是建構文化的工具。兩人的著作皆主張隨著社區的發展和社區關係的更新，宗教活動的內容和形式，也隨之而作出相應的轉變，但其文化意義和社區角色仍然維持下去，其生命力是十分頑強。

兩本著作皆圍繞著一個相同的問題，就是儀式行為和象徵符號具有怎樣的社會功能？他們的研究著重各項變動的層面。他們兩人皆指出傳統文化不斷受到現代化發展的重塑，「傳統文化」、「社區」和「族群」等皆是一連串的建構和再建構的過程，是變動不居的東西，是由具有詮釋權的人物或團體依據其所處的生態和社會環境來規範其內容和定義，是各群體、各族群和各種社會關係互相影響和互相協調的結果。兩本著作加深了我們對本港社區歷史的認識，解讀了本港社區的現狀、過去的歷史和傳統文化三者間的互動關係。

那麼，在上述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的問題會是甚麼？我們或應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可以有三方面。首先，推動這些宗教活動的代理人和媒介，例如喃嘸師傅和廟祝，在建構社區關係、活動型式和宇宙觀念等項目中扮演什麼角色？這些代理人是否只是被動的文化建構者？還是主動的導演？這些代理人又如何理解其自身的角色和功能？例如蔡志祥的著作多次提及在不同的場合，喃嘸師傅曾改變當地的打醮儀式，這些改變對於村民的宇宙觀、社區

關係或「傳統文化」有甚麼影響？其次，儀式行為和象徵符號的延續能力和約束空間是怎樣？具有詮釋權的人物、團體、組織或社區的詮釋空間是怎樣？這些行為被認同為「傳統文化」後其權威性又是怎樣？隨著長洲的經濟和社區發展，在很多層面上，各族群的界線已逐漸融和，為何他們仍會以族群的地緣因素作為組織打醮活動的標準？島上移居岸上及進入了政治架構的「水上人」又如何界定其族群身份？潮洲人的財力在打醮活動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何又不能重新解說潮洲喃嘸的作用？最後，國家權力與地方認同的關係又是怎樣？這兩本書皆強調了政府和國家的權力不斷滲入與再構地方的宗教活動，長洲的打醮和天后的崇拜皆受到其影響，但是在某些層面上，國家的力量和象徵卻不彰顯，例如很多地方的打醮幽榜上仍一再書寫：「民國某年某月 寶安縣 」。近日政府機構積極參與了本港著名廟宇的重修，但是廟宇的佈局仍是古代衙門的模式。是政府加強了廟宇的模式？還是廟宇吸納了政府的資源？政府在伸展其權力之時，其與地方宗教活動的代理人或媒介的關係是怎樣的？從上述兩本著作上，我們應對本港的宗教活動與社區關係有更多和更深入的研究。

最後，這兩本著作的出版為本地社區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論說。現今方興未艾的本地研究所面對的一項困難就是有關的著作太少，這兩本著作填補了過去研究的部份不足。通過由淺入深的描述方法，這兩位學者讓讀者了解本港民間的宗教活動的形式、程序和參與的人物，並通過對上述各項了解來剖析本港地方社區的界線和社群的關係。書中很多資料是他們兩人經過十多年的親身參與觀察而記錄下來的，這些珍貴的資料有助我們進一步探討本港的社會發展。故上述兩本著作是值得推薦給各有興趣於本港社區歷史和宗教活動的讀者和研究者的。